

■ 责编 / 版式 王连同
■ 校 对 张 珊

难忘的记忆

——拜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汤洪高教授

聊城市教育局 闫西龄



偶见一份任命书

1993 年，我儿子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技大学或中科大）。录取通知书写明，9 月 3 日、4 日报到。我决定届时送儿子上学。8 月 29 日我从《光明日报》头版看到如下任命消息：“汤洪高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新华社合肥 8 月 28 日电，国务院决定，任命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物理学家汤洪高教授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任命微波专家余翔林教授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汤洪高现年 54 岁，山东阳谷县人，长期从事晶体物理研究和激光晶体生长、光学特性研究，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
我惊见新任中科大校长是阳谷人，随即和阳谷县教育局打话，接电话的是局办公室主任袁明柱老师（他是我在在平一中高中上学时语文老师），袁老师告诉我：“汤洪高家在张秋镇，是阳谷的名人！”又特意说：“西龄，他和你一样也是山大化学系毕业。”

我听到此消息，怀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心情，立即拨通了山大化学院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院长李福昌老师，他以极为熟悉的口气说：“很了解！他是 1962 年毕业的，和你李致冉老师是一届。”又用很气实的口气说：“西龄，你有事啊？有事去找他就行！”我回答说：“没什么事，我儿子考上中科大本科，今天收到的《光明日报》刊登了国务院任命汤洪高担任该校校长的消息，故打电话询问。”李院长说了句“噢！他当中科大校长了，我马上找这份报纸看看。”

初次相见

9 月 3 日，我和儿子乘专车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办好报到手续，一切安排完毕，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我打听到汤校长在学校内，决定前去拜访。在询问汤校长住处的过程中，遇到的是一张张惊讶、惊奇、又有些神秘的表情，透出的意思是“你是干什么的？找校长？”

我敲门后，打开一点门缝的是一位中年女同志，我说：“我从聊城来，是送孩子上学的，报到手续全办完了，孩子也安排好了，没什么事，想拜访汤校长！”她听罢，说：“噢！是老乡，进来吧，老汤在住 10 分钟下班。”后来知道，这位文质彬彬、很有修养的女士，就是汤校长的夫人，叫张九如，也是阳谷人。

刚过 10 分钟，就有开门声，我想大概汤校长回来了。便站起身，见是一位中等身材、温文而雅、颇具学者风范的中年人。张女士马上介绍我说：“这是聊城送孩子来上学的同志。”汤校长说：“噢！聊城老乡。”我随即说：“我是山大化学系毕业，听说您也是。”“那我们还是校友哩！”他脱口而出。“虽是校友，但您留山大的同学都是我的老师！”我如实说道。

这时，汤校长夫人说：“饭好了，老乡也在这里吃吧，边吃边聊。”

我郑重认真的说：“我是不速之客，很冒昧！我有一个请求，请校长和夫人咱们到外面吃顿饭，好吗？”汤校长用很肯定的口气说：“你送孩子上学，来到科大，哪能叫你请客！院内就有很好的饭馆，你把孩子叫来，我请你们吃顿饭！”我有些不知所措，汤校长又说：“不用客气！”随拉我到门口，指着不远的一个楼房说：“饭馆就在那楼上，你去把孩子领到楼下，我随后也到。”见校长实实在在的样子和话语，我只好从命。

广泛而坦诚的交谈

我把儿子叫来，到达餐厅后，汤校长已让秘书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我和校长都酒量有限，只是小酌，边吃边谈。起初我有些拘谨，随交谈的深入及汤校长的感染，我也便无拘无束。中科大是自然的话题。该大学是 1958 年由中国科学院创办的一所理工科综合性重点大学，它的创办被称为“中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是该校的首任校长。以后的校长也是由严济慈、谷超豪等著名学者担任。汤洪高也是第六任校长。席间，汤校长很有感触的说，办所大学不容易，什么工作也不干，每天也要支出 30 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他教导我儿子，要专心

刻苦的学习，从各方面提高自己，不能认为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了。

经交谈知道汤校长老家在阳谷县张秋镇上，1955 年他在当时的县城寿张中学（当时该校只有初中）毕业，随后和镇上七八个同学一道步行去济南，报考济南三中高中，所以跑二百多里地报考济南三中，是因为家庭贫困，而在济南三中学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考试结果，只有他一人被录取。汤校长很感慨的说，从张秋到济南步行需三天，开学或放假回家我大都步行。这是当今学生难以做到的，可以说，他们连想都不敢想。1958 年他高中毕业，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到山东大学化学系。1962 年他大学毕业后被确定为赴苏联留学生，但因中苏关系破裂而未果。我问他，你化学系毕业，怎么成为物理学家？他说，我在山大化学系大四分专业时学的是晶体化学，毕业后留苏未果，遂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晶体物理学。晶体既是化学研究对象，也是物理研究对象。

汤校长研究生毕业后，被留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晶体学研究室工作。1973 年调至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任激光晶体研究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研究员。我问道，您搞晶体研究，山大化学系晶体研究全国有名，为什么不从北京调至山大而来合肥呢？汤校长坦诚的说：“山大是我的母校，我首先提出回山大，而且山大也很欢迎我去！但中科院不同意，我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席间，秘书前来提醒汤校长说，某会议快开始了。汤回答：“告诉某某同志，让他主持开吧！我这学弟知识丰富、信息颇多，很有见地，我们多聊会。”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给各行各业带来了生机，出现了群情振奋、积极进取的新局面。这时的汤校长决定出国深造。由于他科研成绩卓著，被中国科学院选拔为首批留学生之一，于 1979 年 7 月派往英国留学，曾在牛津大学、哈尔大学任客座研究员。留学结束，他谢绝英国大学的挽留，于 1981 年 9 月回到国内。我曾问，那时很多留学生没有回来，“您怎么没留在英国呢？”他说：“论待遇，在英国肯定比国内多很多，但在国外缺乏亲情感，没有家的感觉，思来想去，还是祖国好！”1984 后，汤洪高先后任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党委书记，中科院合肥分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1990 年 5 月调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

我们曾谈论前不久《光明日报》头版刊登的“中国大学四强”等高校话题，也谈论基础教育及孩子的培养。汤校长有两男一女，都考上名牌大学，两个孩子已出国留学，一个在国内读博。他说：

“我对孩子从小要求严格，从不许他们乱花一分钱，上街买菜回来一定要报账。不是我没钱，而是要从小养成孩子珍惜劳动的品行。”当他知道我女儿山大毕业已出国留学，今考上科大的是长子，次子在中学成绩也优秀时，满怀喜悦的说：“非常好！都有出息！”我们交谈兴致甚浓，也有点海阔天空。汤校长于这年春天曾回阳谷探亲，所以也谈到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变化。汤校长既有着山东人特有的敦厚，又有着科学家兼教育家的严谨与睿智。我不时向他请教，他曾鼓励我说：“不错！很感谢你注重学习，且有分析判断力，继续发扬啊！”

近 9 点，我们离开酒店。汤校长要我们到家中喝茶。考虑到校长劳累而且还要工作，我们只小座。

要离开时，我坦诚的，在聊城我不属于消息闭塞者，但我在看到《光明日报》那份任命书之前，并不知道您，很应报道报道您。“不必吧！”他说。我讲，这也符合聊城地委行署“宣传聊城”的要求。他走进书房拿了他的 3 张照片和简历（打印件）送给我。我们随告别回到宾馆住地。

第二天，我打电话和汤校长告别，由司机师傅开车回到聊城。

《聊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汤校长

这次去中科大，汤校长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印象，我从心里想写一写。但由于工作忙，也怕写不好，而没有马上动笔。一个月后，才写了篇短稿《情系家乡热土——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汤洪高教授》，刊发在 1993 年 10 月 10 日《经济文化报》上，很有反响，引起各层人群的惊叹！有的惊叹“物理学家，阳谷人！”有的惊叹“是中央候补委员！”多数人惊叹“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是聊城人！”市委宣传一位山大学长给我打电话说：“报道应写的再深入些，字数再多些，应投《聊城日报》”我很赞同。但同样鉴于上面讲的原因，直到第二年 4 月，我才动笔写了《担起历史重任，培养科技英才——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汤洪高教授》一文，刊发于 1994 年 4 月 29 日《聊城日报》头版头条。这下子影响更大了，我不断接到电话，有熟人，也有不少不相识者，还有些拜访者。当时聊城师范学院（聊城大学前身）领导人，委托一位姓胡的同志几次邀我吃饭。这位领导也是阳谷人，好像和汤校长还是初中同学，我只好从命。在宾馆一起吃午饭，下午继续交谈、聊天，又一起吃晚饭才结束。他们很羡慕我和汤校长相见并交谈的那么好，其他人去找“大都让秘书接待”，该校一位处长深有体会的说。

我将上述报纸都及时邮寄给汤校长，他给我复信并邮来中科大的一些资料，包括 1994 年 2 月印制的大开本精制像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该资料结合照片用中文和英文，全面介绍了中科大。

那时，是 7 月份高考。在高考前，我将汤校长写的《科技英才的摇篮——中国科技大学》一文，推荐到《聊城日报》，被该报刊登于 1994 年 6 月 4 日头版。汤校长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人生的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高考志愿的选择，正是这样一个确定人生奋斗目标的紧要关头。如果你有志于献身人类的科学技术事业，有志于攀登 21 世纪的科学技术高峰，那么，科技英才的摇篮——中国科技大学无疑是你理想的选择。”这段话对当前的高考生仍然很有意义。

发表该文的《聊城日报》邮到中科大，当时，汤校长正在国外访问，他让秘书（汪克强）给我写信致谢。

以后，我和汤校长也进行了不少友好联系。
1998 年 7 月汤洪高任中科大党委书记，2001 年 9 月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2003 年 3 月任全国人大常委。
今年是汤洪高教授 80 岁诞辰，谨祝健康、长寿！

（2019.5.1.完稿，7.8 修改稿）

汤洪高，1939 年 9 月出生，山东阳谷县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1966 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79-1981 年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任客座研究员。历任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机械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党组书记兼合肥分院副院长，1990 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1993 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北京）院长。1998 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中共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2003 年 3 月当选为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十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汤洪高教授长期从事晶体物理和材料物理等领域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40 多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及省市多项成果奖和贡献奖。



1958 年，一所“新大学”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一、从解放军那抢来校园，从北大清华那抢来学生

那时胆子大，我们就在报上登了广告，什么时候招生，招多少人。可是，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办？广告上登的校址是北京西苑。这一宣布，中调部的负责同志着了慌，因为西苑的房子是他们单位的。他们找到杨尚昆同志说，郭老办科技大学要占我们房子，怎么办？

于是尚昆同志就找我，说“劲夫啊，你们怎么搞的，也没同我商量商量。”我说：“广告已经登出去了，不好改了。”尚昆同志感到难办，说：“我给你想个办法，中央党校二部的房子刚刚交给军委，地点就在玉泉路八宝山旁边，只是这块校址此前已商定交给解放军工程兵设计院。你去找军委秘书长、参谋总长黄克诚同志。”

我就去找黄老请求支持。黄老在军内很有威望，当即表示支持，下令已进驻的工程兵设计院搬家。聂总也表示支持。我又向郭老汇报这件事，我对郭老说：“借你的牌子我俩一起去看看工程兵设计院的院长唐凯同志吧。”

我俩一到，唐凯同志已迎了出来，热情得很，一见面，这位唐将军快人快语主动先开了口：“郭老来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保证在一周内搬家，绝不会耽误开学。”
——张劲夫（曾任中科院副院长）

二、陈毅在科大毕业典礼上：要给大家磕个头

陈毅在中国科大一次毕业典礼上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好当，因为口袋里没有钱。如果口袋里有钱就好好办。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工作，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到时候，我就给大家磕个头。他两手抱拳作揖向大家致敬。
——楼望和（中科大 65 级校友，中科大首届硕士）
学校筹备处举行第 1 次系主任会议。杜润生、郁文、晋曾毅、张新铭、赵志尧、施汝为、华罗庚、钱学森等 3 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特别指出本校具有以下几个特色：1、功课要量多质高；2、基础课和专业技术课兼施，培养多面手；3、红专并重，以红带专；4、贯彻勤工俭学精神。
——人民日报 1958.7.28

谁说中国大学无故事：你可能知道的中科大的五个段子

三、钱学森一道题考昏倒四人，全班再读半年

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担任了科大第一任校长。他经常到学校主持工作，还到学生食堂与同学们共进午餐，检查伙食质量。

老一代科学家对科学技术，对技能训练非常重视。当时的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老先生亲自给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后来，严老兼任了中科大的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校长，名誉校长。你们现在在西校区就可看到一个很大的严老铜像。

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先生兼任科大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系主任，给一年级学生讲高等数学。当时很多非数学系的学生，也常常挤到教室听华老那生动风趣的讲课。

中科院物理所的钱临照研究员，给技术物理系的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课。钱学森先生后来也成为中科大副校长，为了怀念他对科大办校的贡献，学校在东区图书馆前的小花园里也为他树立了一个铜像。

钱学森先生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文简称中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长达 20 多年，《钱学森“火箭技术概论”手稿及讲义·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收录的“火箭技术概论”课程，最早是为 58 级学生讲授的。

当时每一讲发上一次的讲义，具体流程是这样的：每周四上课，上课时由助教将授课内容记录，周四下午至周六助教会将课堂记录整理好交给钱先生，周日由钱先生校订。周一记录被退回助教核定，之后马上付印，再在下一周课时候发到学生手中。

“火箭技术概论”一堂课 3 小时，每周 1 堂课，共 13 周，之后复习考试。因为没有课本，学生需要十分努力地记笔记。又过了一年，钱先生将讲义整理成为专著《星际航行概论》，送给 58 级、59 级学生。

听过钱学森课的人，无不为其精彩而赞叹。钱学森继承了恩师冯·卡门的经典德国学院派授课方式，上课只靠两根粉笔和四块黑板。口齿清楚，层次分明，板书漂亮，而且四块黑板、两根粉笔用完，下课铃即响。冯·卡门要求自己的学生不仅在科研上达到自己的要求，授课也要达到自己的水平。钱学森也如此，上课先用几分钟讲讲大的科研背景，然后外衣一脱，旋即开讲，整整 3 个小时。

钱学森还特别注意听课者的感受，在大的阶梯教室，他专门安排人检验自己的板书在最后一排是否能看得清，自己的声音在最后一排是否能听得清。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的徐建中院士回忆，一次下课稍早，钱先生让大家对讲课提提意见，自己曾写一张纸条提出：辅导老师出的课后习题有些一再改动，同学们做了一遍又一遍，同学们负担很大。钱先生想了想告诉大家，不要怪辅导老师，题是自己出的。

一开始觉得题目各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再想想，觉得有些条件不太好、有些地方不够准确，于是就有了改动。“这样再三改动给同学们带来了不便，责任由我来负”。徐建中院士说，钱先生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还为学生习题殚精竭虑的精神一直影响着他。

以钱学森当年的办学理念，中科大应该坚持理工结合、研教结合，他和同事们为许多学科拟定的名称前面都是有定语，诸如：高速空气动力学、喷气动力热物理等等，钱学森和他的同事郭永怀、吴仲华等人不同意将其改名为“空气动力学”和“热物理”，因为他认为中科大的培养方向应该指向应用与高科技领域的最高级人才。

也正因为如此，当大量的教学人员都是科研一线的高级研究员，所教授的课程也都是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当时中科大量的课程没有讲义，这和当时国际上的一流大学也是类似的，因为已经变成讲义的教学内容，客观上已经不是最新的课程了。

中科大一直坚持的“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理念，也是钱学森教育思想的一种反映。今天中科大每 1000 个毕业生中就会诞生一个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正是得益于这种理念，这也是中科大有理由自豪的。
——《科学时报》(2008-7-31 读书周刊)

这门课程叫做《高等数学引论》。这门课华先生一讲就是三年，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有华罗庚先生这样著名的大数学家给刚刚踏进大学校门的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哪怕讲授一个学期，一个学年，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我们都知道，华先生非常繁忙，除了从事数学研究外，还承担着许多社会活动与事务。然而，他一讲就是连续讲三年。这在国内恐怕难有望其项背者。

每次他一走上讲台，很少有废话，拿起粉笔就开讲，而且不时在小小的讲台上踱来踱去。还不时地点上烟，拿在手里吸上一口，很快就吐出。华先生每次来讲课，送他的汽车都开到教一楼的楼边，时间久了，我们连他的司机老于师傅也熟悉了。

第二，这门课程配备的教师团队之强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由三个层次构成。这门课程由华先生主讲，正所谓“庖丁解牛，一条龙”的“龙头”。其次是由王元先生来担当华先生的助手。再其次就是助教队伍，有韩京清、周永顺、邓诗涛等多位老师。

——颜基义（中科大 58 级校友，中科大研究生院原党委书记，中国科大北京校友会原会长）

四、个子小就能公交免票的科大少年班

张亚勤 1978 年考入中国科大时年仅 12 岁，是全国最小的大学生。张亚勤回忆金榜题名之后，在地图上费尽心思寻找合肥地标的经历：“那时的地图，用圈标明城市的大小。北京有三个圈；太原有两个圈，而合肥只有一个圈”（所以难找）。初到科大，亚勤称当时学生流行的爱好是互相询问高考成绩。

自以为高考成绩不错的他，知道山西高考第一名是 410 分左右，而他问到的第一位同学来自江苏，“高考 420 多分，再问一位来自江西，高考是 450 分。我写给母亲的第一封信感叹，合肥很小、南七更小，科大却很大”亚勤回忆了特殊时代国人对“裤子大”和少年班学生的眷顾。合肥公交车上的乘务员常因为个头猜出他是少年班学员，因此享受免票待遇。

——张亚勤：1978 级中科大校友，现任百度总裁

五、在科大才知道什么是尖端：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干部的，因此学生必需在学校里打下将来作研究工作的基础。…这在科技大学分两类：一类是基础理论，也就是物理、化学和数学；一类是基础技术如机械设计。这些基础课在科技大学教学计划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基础理论课在各个专业里略有不同，但占总学时三分之一左右；而技术基础的学时也占总学时的百分之十几。所以基础理论的比重在科技大学比一般工科学院要高，而基础技术的比重又比在一般理科专业要高。

我们重视基础理论的原故，是因为科技大学的学生将来要从事于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既然是新科学、新技术，要研究它就是在尚未完全开辟的领域里去走前人还没有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去摸索，摸索当然不能是盲目的，必须充分利用前人的工作经验。……科技大学里的物理、化学课除了教知识、注意和各个专业相结合，更注重这两门基础理论的系统性，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全面概念和图象，要他们成为这两门学科的主人。

——钱学森：人民日报 1959.05.26 第 6 版